

刘垣与他的《张謇传记》

□胡磊

刘垣作为张謇的重要助手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的珍贵感触,为我们理解清末民初的那个时代和更多张謇的史实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上世纪50年代,在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经常能看见一位老人,一丝不苟地查阅资料,这位老人叫刘垣,他不辞辛劳,是为了写作《张謇传记》。

刘垣并不是第一位研究张謇的人。张謇在世时张謇研究即已开始,陈藻青1911年在《新语林》发表《张謇》。1926年张謇去世,其独子张孝若悲痛填膺,耕耘四年,批读四载而成60余万字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由于张孝若的特殊身份,以及他所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和较为公允的评述和平实的文风,使之成为研究张謇生平业绩的第一部权威性论著。

张孝若对刘垣很熟悉,他曾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评价刘垣“刘先生才识优长,品格最高洁,我父遇到大事,或疑难之事,得其一言,无不立决……是我父生平最爱重的人”。

刘垣,字厚生,1873年出生,江苏武进人,早年在南洋公学任国文教师,1900年与张謇结识,得到张謇的赏识和提携,参与了张謇在通海地区事业的开拓。

刘垣曾先后担任通海垦牧公司股东、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董事、大生纱厂第二次股东会股东会议事会议长。1913年,张謇出任熊希龄内阁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刘垣应邀担任农商次长,并与张謇合著了《棉铁世界》一书,此书提倡的棉铁主义对此后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920年,刘垣积极支持张謇倡议的中比合作创办航业与贸易公司的动议并投资。

从1900年与张謇相识,到1926年张謇去世,张謇所牵头或参与的重大政治和经营等活动,刘垣大多参与并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并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勤恳,成为张謇的左膀右臂和智囊人物。张謇曾用“亮直、敏达、介特”评价刘垣,意思是指刘垣诚实正直、敏捷通达、不随流俗。

1949年上海解放,刘垣结束在天津的寓居生活,于当年12月定居上海,开始搜集资料,编写一部《怀旧录》,记录已故亲友的言行及其与当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有关的史料。

刘垣最初设想作传记的人选有十多人,但最终选择张謇作为对象,一方

面是因为考虑到自己年老体衰、时不我待,不可能去完成十多人传记的任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刘垣跟随张謇的时间较长,“张謇一生所经历的时间较长,事实最多,尤其在我国历史上转变最大而又最早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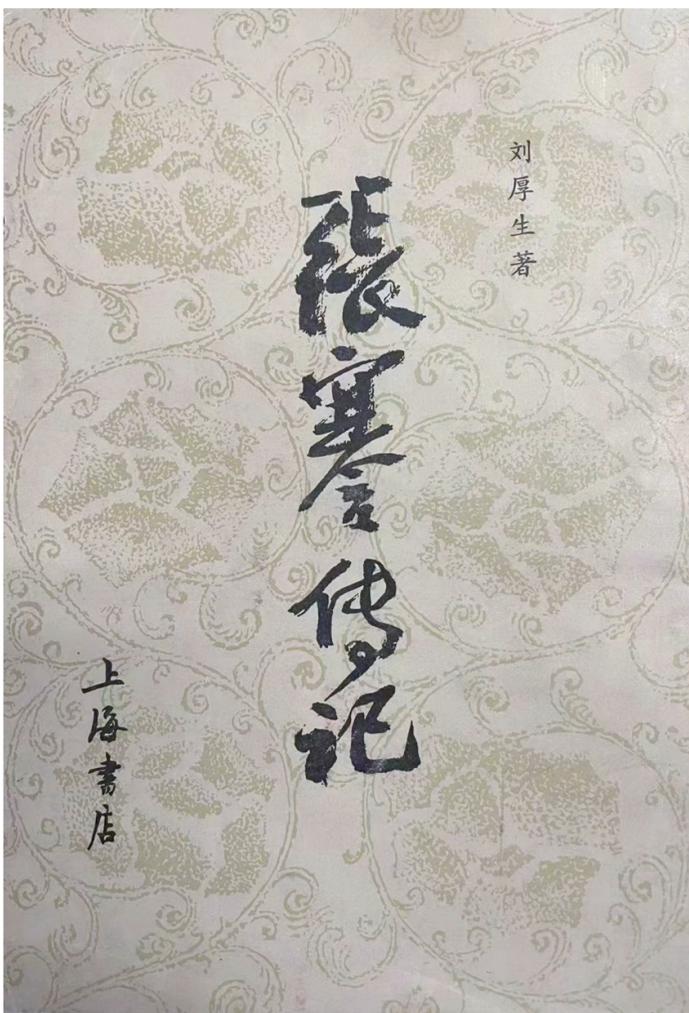
刘垣1950年3月开始动笔,借张謇传记为线索,记述了张謇在幼年、青年、中年和老年不同人生阶段的活动,作者以他的亲历、亲见和亲闻,叙述了张謇和一些重要人物的活动和言行,梳理了很多政治事件背后的人物关系。对张謇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国际形势、政治背景和社会经济情况也叙述详尽,这些内容占了全书内容的十之七八,特别是对晚清民国的政治局势进行一种大体上的描绘,保存了很多重要的史料。

在清末民初政局部分,刘垣对关键事件尤其是“宋教仁被刺案”和“洪宪帝制”的钩沉非常到位,书中判定宋案是“洪宪帝制”最得意之一幕,而其结果则是“洪宪皇帝”不可医治的致命创伤,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刘垣对张謇的评价非常中肯,虽与张謇交好,但能实事求是、直言相告、秉笔直书。譬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无暇东顾,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产品倾销,大生纱厂的利润迅速扩大,有一年大生纱厂给股东分红股息达到百分之五十多,刘垣给张謇写了一封长信,指明此举违反了经济学的原则,并拿欧美各国国家资本所给股息和上海、无锡各纱厂之股息比例进行忠告,必须防范风险。好景不长,刘垣的预言不幸言中,1922年后,大生企业连续亏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于1925年8月被上海银团所接管。

刘垣认为张謇有眼光、有魄力,但不是一个政治家,张謇因纺织而推广的其他事业之中,以棉业为最有价值。刘垣认为张謇的长处在于度量宽宏、性情豪爽,胸无城府,接人待物,开诚布公,绝无成见,并且富于为社会服务的热情,并举了一些事例进行说明,刘垣的这些观点不无道理。

但是在《张謇传记》中,刘垣对张謇的有些评价是有失公允的,譬如刘垣认为“导淮为张謇平生奔走劳而无功之空想”。很显然,张謇一生围绕



《张謇传记》影印本书影

着治理淮河做了大量工作,在通州师范学校设测绘班培养人才,组织了江苏省近代第一次大规模的水利测量,还撰写了《江淮水利施工计划书》。张謇倡导提议的“导淮”“三分入海,七分入江”的分疏(水)比例,与新中国成立后治淮规划中入江入海流量很接近,奠定了淮河水道今天的格局。今天的河海大学前身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也是张謇于民国四年(1915)所建的,是当时的全国第一所水利学校。

受历史环境影响,《张謇传记》难免有其局限性,作者的一些观点

难免有失偏颇,但是总的来说,刘垣作为张謇的重要助手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的珍贵感触,为我们理解清末民初的那个时代和更多张謇的史实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况且他以耄耋之高龄,历时八年,完成《张謇传记》的手稿并付梓出版,成为继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后,内地学者关于张謇生平的一部力作,为后人研究张謇、了解张謇提供了更多的历史资料,这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精神,不失为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九圩港开挖亲历记

□司会元口述 杨建彬、金茂娟整理

都得去开河工地,工程需要的粮草,由生产队用船只运送。

刚开始的个把月,民工们的基本口粮按每个民工一天供应1斤12两(十六两制,相当于现在的1.7斤)的粮食计划,后来因为供给不上,缩减到每天1.2斤。早上和晚上在指挥部吃饭,中午饭是伙食房的人员将饭菜送到工地,民工们坐在扁担上现场就餐,只能是萝卜汤、大头菜汤、白菜汤之类的素食,一个多星期才能开一次餐。所谓开荤,就是从生产队畜牧场宰一头猪送到工地,一个民工差不多半斤的样子。高强度的劳动,油水又十分清淡,晚上四两粮的饭实在吃不饱,无奈,民工们在前往工棚睡觉的路上,从邻近生产队畜牧场种植的萝卜田里,悄悄地挖几棵,用稻草擦掉表面的泥土,就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整个一冬,那大片的萝卜就被挖得所剩无几了。有的民工觉得肚子实在“寡”了,偶尔在晚上收工后从工地步行回家想捞点“外快”。可那个时候,生产队正是吃食堂的年代,都是供给制,家人本身就难以填饱肚子,只有家里人从牙缝里省下点粮,才能圆一回勉强饱一餐的奢望,豆饼团、榆树叶团、黄玉米蚕豆叶团、兔儿草,这些纯粹的猪饲料,在那时却都成了人们的充饥食品。

民工帐棚

工地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兵团式作战,团与团、营与营、连与连展开土方竞赛。从早晨的起床号直到太阳落山,高强度劳动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每个工日得完成两三万土方。因为工地距离家乡有10多华

里路程,只得住宿在工地的临时帐棚内,帐棚是用稻草鞣起来的,三四十人合住一工,里面悬一盏美孚灯(马灯),稻草打的地铺,直接铺在地面上的稻草,经历了一个冬春,便有些霉烂了。帐棚外放置一只粪桶,用于民工们夜间排尿。同期去的女民工被安顿在一座水车篷内,周围用杆帐一围,就算是居所了。

我听几位参加九圩港工程勘测的水利员说,开挖九圩港是南通解放后第一大水利工程。该河原为明隆庆元年泓沙形成的小港,弯弯曲曲,容量蓄量很小。根治九圩港,实际上是重新开挖一条规模宏大的河道。西起长江边,东至如东马塘镇,全长46.62公里,设计河底宽30—200米,挖深—2.0米,边坡要达到1:3—4,河面最宽处达300多米,窄处也有100多米,在开挖河道的同时,还要在九圩港口建40孔总宽达236.55米的大型水闸,全线建造数十座跨河桥梁。一个冬春要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简直不可思议。

经过10多万民工长达7个月的浴血奋战,至1959年6月5日拆坝放水,九圩港开挖工程如期完工,真是“人心齐泰山移”啊!

我今年82岁,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的民工付出的太多、作出的牺牲太大了、可歌可泣。虽然饱受过困苦和艰辛,也值得。因为解放前,南通水利基础设施差,虽滨江临海,但常受洪涝灾害侵袭。特别是九圩港沿线地区,十年九灾,不是旱就是涝,遇上大雨,田野里可撑船;遇到干旱,玉米、大豆大部分枯死,人们饱受灾难之苦一言难尽。自从有了九圩港,我们这一带,可就是早涝保丰收啦!

历史人物

南通的稀有姓氏

□王士明

姓氏的来源与人口的来源密不可分。南通,旧称通州,唐代以前是长江中的沙洲,其中的一个沙洲称为胡逗洲,《太平寰宇记》称胡逗洲,“上多流人”,唐玄宗时(722年左右)始辟为盐场,其中的南布洲(今金沙一带)为流配犯人之地。不久,黄巢兵起,北方震动,从黄河流域迁来一批避乱的难民,主要从事盐业、渔业,间或从事农桑。唐代末年,人口渐繁,最早的土著,当推从河北保定迁来的张、王二姓,以及岐山的姜姓、清河的崔姓、汝南的李姓、鲁南的曹姓等。

宋初太平兴国年间(976—983),通州已有盐场七处,煮盐之地,往往以姓称之,有姜、袁、瞿、李、周、秦、唐、严、顾、蒋、朱、王等姓。南通人的来源主要是各地的移民。大量的移民则始自北宋、南宋交替之间,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各种姓氏相应增多,元末明初,通州为张士诚所据,群雄争战,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南京的谢氏,含山的陈氏,通州的顾氏、刘氏,迁至金沙一带定居。朱元璋定金陵,遂招抚流民,同时从江南移民,到淮南垦荒。永乐年间(1403—1424),南北大运河恢复通航,商旅频繁。这期间,从苏常道迁来的,有邱、陈、宋、蒋、李、金、吴、张、李、施等姓;从杭嘉湖迁来的,有赵、姜、彭、蒋、杭、夏、俞等姓;从南京和扬泰地区迁来的,有周、刘、胡、戴、秦、马等姓;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明、清以来,盐、米、纱、布等各业兴旺,市场繁荣,五方杂处来通定居入籍者众多:既有南京的许、芮等姓,句容的汤、白等姓;又有镇江的丁、茅、郭、庄、巫等姓,丹徒的徐、卜等姓。既有苏州的吴、邱、宋、费、归等姓,又有常州的季、翁等姓。此外,还有安徽徽州洪、王、程、赵、胡、金等姓,以及宁波、杭州的叶、沈、陆、俞等姓。在这其中出现了一些稀有的姓氏,如安、居、米、步、冉、房、贲、韶、铁、戎、嵇、臧等等,甚至还有姓“是”的,姓“东”的。

解放以后,由于工作分配、调动及婚嫁、经商等各种原因而定居南通的,姓氏之广超过历次移民。还有少数民族的姓氏,如回、蒙、畲族的马、彭等姓,并出现了欧阳、尉迟等复姓。由于移民源自全国各地,以至出现了“同姓不同宗”的姓氏,如张氏就有“东张”、“西张”之分。余西曹、季两姓有“九季十三曹”之说。

综上所述,南通的姓氏(包括稀姓)是随着人口的迁移而逐渐增加的,也与南通成陆的过程密不可分。

沙令祥:旧札思故乡

□彭伟

沙令祥女士是如皋乡贤沙元梁的三女儿。1914年,她生于如皋沙家顾园。1933年毕业于如皋师范,任职于李堡小学、马塘小学、安定小学、耕茶小学诸校。1946年12月,沙令祥追随夫婿缪进三(耕茶人)赴台。缪先生出任台湾农试所农艺系主任,她任教于台北,嗣后寄居他乡。

沙女士高寿,今年(2022年)已有108岁。她还工画。欣羨其寿,又结乡缘,我向她求过画。近来,如皋市侨联原主席解志明老人读过数篇我写的有关沙家历史的小文,又割爱送来一张沙令祥女士的亲笔信。这封旧函的落款是“缪沙令祥手启 12月11日 灯下”。解老还给我提供了相关背景材料,从中不难看出此札写于2006年12月11日。那年10月28日,沙家老宅——顾园重建工程圆满竣工。沙家老宅经过城市改造,附近留有空地。起初规划在此修建圆仁和尚纪念馆。多位如皋知名人士结合如皋历史及实际情况,殷切呼吁修建顾园,纪念如皋沙氏乡贤。尤其是张秀良、解志明等人,连夜搜集史料,起草文件,于炎炎夏日中边挥汗,边撰文,完成相关提案。事情迎来转机,新顾园建造完毕。解志明致信香港旅港如皋同乡会会长丁伯麟先生及寓居台湾的沙令祥女士等人,通告顾园完工的喜悦。他们均有回函,或感激,或赞誉。沙女士回信的第一句话便是:

日昨(笔者注:即12月10日)接奉大札、四张照片、一本《风华集》,如获至宝,深感阅心。长途寄厚书花费甚多,感谢再感谢。

四张照片所摄的正是新建的顾园美景。新顾园位于老顾园(今海月寺附近区域)的河对面,内有志顾堂、百花园等景观。新顾园由刘聪泉、冯际虞等人精心设计,或撰写对联,或提供史料,又在院中竖立一座如皋近代乡贤——沙元炳雕像。因此沙令祥作为沙家后人,看到四张顾园新照,不禁赞扬:似乎走进苏州拙政园,古色古香,(屋)气宇庄严,“诱导”外国游客来园观光。

至于那册《风华集》也勾起了沙令祥的思乡之情。《风华集》是冯际虞等人编写的。冯老师是如皋中学的退休老师。《风华集》是如皋中学的校友回忆录。此校的创建与发展,和沙元炳、沙元梁堂兄弟关系密切。沙令祥读后,往事如昨,乡情如梦,写道:《风华集》阅后,仿佛回到故乡见到三弟沙旅、五妹沙堤、表侄黄允(曾任如皋中学校长)。尤其是书中提及的两位如皋中学校长,更是令沙女士感慨良多。一位是何景平校长。他曾先后出任紫石中学、如西中学、如皋中学校长,是如皋有名的民主人士。如皋中学图书馆曾经命名“景平图书馆”。沙令祥记得何校长是她父亲的好朋友。他家住如皋南乡(何景平是车马湖人),到城里来便住在沙家顾园。沙女士还肯定何景平的女儿是“如皋光荣的人物”。

另一位是许绍初校长。他是沙令祥的三姑父,留学东瀛,归国后还曾兴办稻草纸学校。沙女士追忆,当年她离如时,从如皋南门车站坐车去上海,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据说当局获得密报,非要抓捕一个姓沙的。沙女士无奈之下,向三姑父求救。经过许绍初的担保,她才能脱身。

在回信中,沙令祥还告知解志明:她正好同时收到五弟沙子惠寄来的照片:城外聋哑学校建筑题名元梁楼。悠悠往事故乡情,沙女士真情坦言,希望:风回故乡,致谢政府。由于台北住房政策有变,她不能离台返乡。

沙令祥在顾园重建后未能回如,的确是不幸,不过幸运的是,解志明保存下她的亲笔信,见证沙家在外人士对家乡深厚的情谊。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并茂。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史海回眸

1958年7月,南通地委作出“奋战一冬春,根治九圩港”的战略部署,11月工程全面开工。南通、如皋、如东三县10多万民工奔赴九圩工地。当时只有18岁的我,响应号召,自始至终参加了九圩港的开挖。

回想60多年前波澜壮阔、轰轰烈烈的场景,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

那时候,我们刘桥公社第九工区的好几百个民工开挖的河段是陈桥公社8大队的朱家祠堂,战线长度30米左右。早上天还没有放亮,嘹亮的起床号就吹响了,民工们就纷纷进入工地,为了赶工期,下雪天照常进行;薄冰天气照常进行,唯有下大雨才会稍作休整。

从西到东,40多公里工地上红旗招展,大喇叭里的歌声、加油鼓劲声、民工的号子声连成一片,热火朝天,使人热血沸腾。整个河段一眼望不到边的茫茫大海,在河段到两岸的积土堆之间穿梭,只有这时候,才会知晓什么叫“人海战术”。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开河工地,一台台挖掘机挥舞着机械臂,将一摆摆泥土倒入运输车内,再徐徐开走,显得轻松自在、游刃有余。然而,人工开凿的九圩港却是天壤之别的两码事。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支前民工用小推车推出来的,那么,九圩港的开凿则是民工们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挖掘出来的!

运土工具

那时施工没有任何机械,劳动工具仅有扁担、泥络儿、大锹,运送土方几乎是肩挑。考虑到上层土比较结实,我们刘桥这一带的民工别出心裁,试着用“四轮平车”运土,就是在地面

上铺设轨道,铁轨镶嵌在约10厘米见方的木板上,一段轨道2米长,一段一段地连接起来,让底部装有滑轮的竹筐(一个工区好几个竹筐)在轨道上人力驱动,轨道两边依次站着一长溜民工,大家流水线式地将挖出的泥袋头抛入筐中,将土送到200米以外的积土堆上,土堆上专门有拉土的人接应。其实,这仅仅是解决了一时的压肩之痛,运土效率一般。

中层土因为含水量大了些,河坡也陡了些,四轮平车无法翻越,就用木制独轮车推运,积土堆高了,独轮车驱不上去时,土堆上的人用带钩的绳子使劲地往上背。独轮车无法行走时,依然是肩挑。

那时,农村木工几乎都去了九圩港工地,专门制作和修理四轮平车、独轮车,这样,做的做、修的修,全力保障运输工具的正常、连续使用。

底层土因为河坡更陡,且含水量大,水汪汪的,只能用泥络儿一担一担地往上挑。特别是挖到深处,从河底到积土堆运距最短二三百米,落差七八米,民工从河底挑一百多斤的担子,爬三四十度的坡,运送到指定地点,需要费九牛二虎之力。“结龙沟”时,水层较深,球鞋固然不好穿,胶鞋也派不上用场,只有赤着脚干!

如东县的民工们,好多是用耕牛拉运土车的,尽管给耕牛增加了棉籽饼之类的精细饲料以增强体能,但终究敌不过长时间超负荷运作,往往是耕牛来的时候膘肥体壮,工程尚未结束已是皮包骨头……

民工伙食

属于一等劳动力的青壮年人几乎